

南开大学



211工程建设项目

面向 21 世纪 国际 经济 前沿 问题 论丛

冼国明 王东 徐冬 著

企业制度 与国际竞争力



经济科学出版社

面向 21 世纪国际经济前沿问题论丛

企业制度与国际竞争力

——对美国、日本企业的比较研究

冼国明 王东 徐冬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文峰
责任校对：王苗苗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贾志坚

企业制度与国际竞争力

——对美国、日本企业的比较研究

冼国明 王东 徐冬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新路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 开 8.5 印张 200000 字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058-2293-4 / F·1685 定价：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全套定价：150.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企业制度与国际竞争力：对美国、日本企业的比较研究 / 冼国明，王东，徐冬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0

(面向 21 世纪国际经济前沿问题论丛)

ISBN 7-5058-2293-4

I . 企 … II . ①冼 … ②王 … ③徐 … III . 企
业管理制度—对比研究—美国、日本 IV . F2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126 号

MAZEP 10/07

丛书总序

在 20 世纪里，世界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 2% ~ 3% 的速度增长，全球的国际贸易量以年平均 6% 的速度增长，全球的资金或资本流动额以高于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增长，全球的劳动力或人员流动的规模比 19 世纪要大得多。世界经济正在走向全球化。

人类社会的这种经济上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家们理论和观点的影响，同样地，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和观点无一不是来自于现实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在 20 世纪里，经济学家们在认识世界经济或国际经济运行中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们对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等都做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与中国的学者相比，西方的学者暂时居于理论的前沿。但是，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我们有一种“后起之益”。这种“后起之益”表现在：我们能够借鉴他们的理论，求证我们的实践。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 应该说，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经济路径，一个社会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很难实现阶段上的“跳跃发展”。因此，作为后起的国家和后起国家的学者，尽管由于我们在工业化实践上的落后导致了我们在

^① 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 页。

工业化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研究上的落后，但是我们借鉴他们的理论，可能有助于我们避免许多重复性错误，少走弯路，进而再实践中实现时间上的“跳跃发展”。这种“后起之益”还表现在：我们可以推进这些理论在某个具体国家实践上的应用。我们总结前沿的理论并非为了将它们奉为“教条”，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认为，一种理论和观点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国度里产生的，它的普遍正确性来自于该理论真理性的一面，它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情况的制约。我们不能要求学者们给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所有答案，因此，当一种具有普遍正确性的理论或观点应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实践中时，需要后起国家的学者们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研究问题。在这里，前沿理论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思考和研究问题。“后起之益”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我们可以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或发展这些理论。应该说真理是没有穷尽的，学者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是，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为接近真理做些有益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基础是前人的研究成果或“前人的肩膀”。

南开大学的国际经济研究有很长的历史。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世界经济运行进行了扎实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在学术界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在社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政府的经济决策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他们的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科学必须在两个领域获得自己的地位：在学术上，要走在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前沿，至少是紧跟本学科领域的世界前沿，在特定的学科领域有理论研究方面的发言权；在现实经济中，在政府的重大决策中要体现我们的研究成果。

南开大学的世界经济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近年来，在世界经济理论研究、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政策实践研究，以及国际贸易新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方面出版了一些论文和专著，巩固和加强了我们的学科优势。但是，我们也深知，这些研究距离我们给自己规定的目 标还有相当的差距。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单打一”的研究很难获得优秀的成果，因此“组织起来”，形成“群体优势”，就成了我们紧跟学术前沿的重要对策。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培养了一批愿意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年轻博士，也引进了一批有才华的国内外高水平的人才，这就为我们的“群体优势”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毛泽东的一句话是特别有意义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因此，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南开大学的世界经济学科也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支持的专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南开的经济学科设立了“经济学·国际经济”子课题，我们从这个项目中得到了从事国家前沿理论和政策系列研究的资金。这是我们继“组织起来”的第一个成果《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后的又一个群体性研究成果。我们试图对部分国际经济前沿理论和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系统丛书为“面向 21 世纪国际经济前沿问题论丛”。在此，我们对经济的全球化问题、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问题、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证、国际投资问题，以及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作用问题的国际比较等进行研究。

经济全球化问题既是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又是当前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各国的学者都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许多学者以矛盾的心理去看待经济的全球化及由此带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本丛书中，我们一方面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试图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新秩序影响的角度进行理性思考，针对国际上讨论的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们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对策问题。后

者的研究主要是战略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操作性。

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交往中最普遍、最容易被各国所接受的形成。也正因如此，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与增长，现实的发展所需要的理论和政策理论的解释被不断提出。继传统的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产生之后，凯恩斯主义的贸易政策理论和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相继形成，并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从而使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受到挑战。本丛书所感兴趣的是，保护贸易政策的经济驱动力是什么？在现实中，它的利弊得失如何？实施保护贸易政策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的余地？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前沿性问题是贸易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程度上有多大？不同的国家在此过程中有哪些差异？以及促进贸易增长的因素有哪些？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政策促进贸易的发展？在这里，计量经济模型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

国际贸易领域中，第三个重要的前沿问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在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中，机制化的经济一体化是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一体化模式，这就是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代表的非机构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开放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学者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模式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定量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国家某些假定的基础上的。本丛书试图以中国为主体进行横截面的计量分析，并证明中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开放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下的合作所得到的利益，以及政府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所应采取的政策。区域经济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所寻求的“次佳政策”，即是一种“对内自由、对外保护”的政策，因此，封闭性是获得区域经济一

体化利益的前提。然而对于一个开放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得失如何评估，以及一国应所采取的政策，则是经济一体化理论的重要课题。本丛书希望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世界贸易体制或多边贸易体制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一些国内外的学者已经对多边贸易体制本身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我们感兴趣的是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问题。在本丛书中，我们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进行全面的分析，以便给学者们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地位问题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答案。

国际投资及其主要载体——跨国公司的发展，是 20 世纪乃至延续到 21 世纪的重要国际经济现象。本丛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和跨国公司的理论和战略进行较深层次的考察。在这里，我们将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前沿理论和管理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总体方向，提出相应的对策。进而，我们还要考察在现实的资本运动中直接投资的特征及其波动性问题。在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技术竞争战略特别感兴趣。20 世纪后期乃至于 21 世纪，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技术优势，这种技术优势在跨国公司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经济的交往中，我们不能离开政府的干预。从理论上，人们追求“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是近年来，世界银行的学者们已经将好政府的标准重新定义，提出“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是在不同国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政府重要性的差异表现在政府参与或干预经济的程度上。本丛书所感兴趣的是不同类型国家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我们将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财政政策理论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当然，本丛书的研究尚未涵盖国际经济前沿问题的所有方面，但是这只是我们这个群体研究工作的开始。

我们希望这种研究能够推动我国的国际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同时希望学者们的研究能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比较科学的依据。

佟家栋

2000年8月1日

目 录

引言：建立分析性框架	(1)	
第一节	制度、交易制度与企业	(1)
第二节	现代企业制度概览	(11)
第三节	建立分析性框架	(20)
第四节	结构安排	(22)
第一章 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基于市场的制度	(25)	
第一节	美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演进	(25)
第二节	对美国企业形态的总体考察	(36)
第三节	基于市场的企业内体制	(41)
第四节	基于市场的企业制度互补结构	(72)
第二章 日本的现代企业制度：基于企业的制度	(88)	
第一节	背景：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	(89)
第二节	日本企业制度的历史演进	(91)
第三节	日本的企业集团	(107)
第四节	日本企业集团的相关性研究	(127)
第五节	基于企业的制度互补结构	(142)
第三章 企业制度的比较：对美国、日本及相关国家的研究	(165)	
第一节	美国、日本现代企业制度的共性	(165)

第二节 美国、日本现代企业制度的差异.....	(171)
第四章 企业制度比较的扩展性研究：从企业绩效 与国民经济绩效的角度.....	(212)
第一节 企业经济绩效比较.....	(213)
第二节 美、日国民经济绩效比较.....	(227)
第五章 美国与日本企业制度的生成环境：文化与 政府的作用.....	(236)
第一节 美国企业制度的生成环境.....	(236)
第二节 日本企业制度的生成环境.....	(242)
主要参考文献.....	(253)

引言：建立分析性框架

企业制度（Enterprise System），在一个国家的微观经济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主体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同的企业制度，对国家的总体经济绩效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对国与国之间不同的企业制度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企业制度的差异对国家总体经济绩效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制度，进而对企业制度的比较，是一个内容复杂、涵盖范围广泛的题目。这不仅是因为企业的制度安排、特征在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不同国家的企业制度遵循着相异的演进路径。因此，我们有必要找到几个研究视角，构造一个分析性框架，以便在不同国家的企业制度之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逻辑联系。

第一节 制度、交易制度与企业

一、对“制度”概念的考察

对“制度”这一概念，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早在 19 世纪，凡勃仑在他的《有闲阶级论》（1899 年）一书中即引入了“制度”的概念，认为制度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和习惯，是当前公认的某

些生活方式。制度就是“大多数人稳定了的共同思维习惯。”^①从凡勃仑对制度概念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凡勃仑的“制度”是一种自然习俗，只是由于习惯化和被人们广泛接受，而成为一种公理化的必不可少的东西。20世纪20年代，康芒斯与加尔布雷思等人把“制度”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有关制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1934年，康芒斯发表了《制度经济学》一书。在此书中，康芒斯把制度作为一个经济变量来加以研究，明确地把“交易”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并通过描述大量的事实材料，揭示制度作为经济变量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说明制度的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及其结果，从而为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及其相关性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在康芒斯那里，制度被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②他进一步解释道，“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甚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准备银行、联合事业集团以及国家。”^③康芒斯对制度概念的考察可以说是十分广泛的；但由于其内容庞杂且没有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论述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因此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④

①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转引自〔美〕道恩·帕尔伯格：“制度经济学的辩护论据”，《经济译文》，1994年4期。

②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R·科斯称之为“近代制度经济学”。R·科斯认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他们没有一个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施蒂格勒指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他们杂文般的笔调读后确实令人痛快，仅此而已。人们很难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1937年，R·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在这篇论文中，R·科斯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分析了企业产生的原因。R·科斯首次把“制度”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引发了经济学研究的革命，从而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的先河。

在R·科斯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制度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对“制度”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T·W·舒尔茨在其《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①舒尔茨关于制度的定义被以后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V·W·拉坦也将制度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②另外，D·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③

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对制度的结构作了一定的剖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D·诺思指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构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强制。它是由非正式的强制（教规、禁忌、习俗、传统和行为惯例）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

^① 参见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D·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律和产权)组成。”^① 其中，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即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所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制度构成的第三个要素是实施机制。实施机制的作用在于它能保证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的实施。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约束就形同虚设。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在涉及“制度”这一概念时，亦接受舒尔茨关于制度的定义，即将制度理解为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法律、规章、社会组织规范等，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不成文的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它们用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调节人或社会组织的行为与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二、两种交易制度：基于市场的交易制度与基于企业的交易制度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系列交易来完成的。无论是在市场中还是在企业中，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活动都是以“交易”为媒介的。这种作为媒介的交易，我们可以称之为“交易方式”或“交易制度”。

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康芒斯的制度分析为我们这里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的研究加以阐述。

^① D·诺思：《制度》，载于《经济译文》，1994年3期。

康芒斯在他的《制度经济学》中，以交易的研究为基础，就制度的一般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康芒斯首先对交易的内涵作了考察。康芒斯认为，交易的本质是所有权的转移，交易的过程是让与和取得所有权的法律活动。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把交易分为三种类型，即“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与“限额的交易”。

首先，买卖的交易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它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交易的结果是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法律上的控制权的转移是一种‘买卖的交易的结果’”，“这种交易以及所准备的法律上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换取一定的代价，我们称之为‘买卖的交易’”。^①从法律角度看，买卖的交易的主体在地位上平等的，但是，由于双方所掌握的市场信息与使用信息的能力，以及资产的特性存在着差别，交易的行动者在经济利益上是不平等的。“买卖的交易中的谈判的心理，是‘劝诱或强迫’的心理，决定于机会、竞争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这些有关方面，虽然人们认为他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却可能在经济上不平等（强迫）或者在经济上平等（劝诱）。”^②

其次，管理的交易是法律上的上下级之间的交易。这种交易以财富的生产为条件，其一般原则是效率。“一个人是法律上的上级，有合法的权力可以发出命令。另一个人是法律上的下级，这种关系存在一天，他在法律上就有服从的义务。”^③从交易的性质来看，在管理的交易中，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在上下级之间存在着命令与指挥、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科层式的组织结构中，尤其是对企业而言，这种管理的交易表现的尤为突出。

^①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②③} 同上书，第81页。